

● 马克思主义哲学

交往理论与历史唯物主义建构

——兼评哈贝马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

何 捷 一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人文学院, 湖北武汉 430064)

[作者简介] 何捷一(1955-), 男, 河南浙川人,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主要从事社会历史哲学研究。

[摘 要] 马克思与哈贝马斯都把交往作为其哲学历史观的重要理论范畴, 并依据各自的交往理论, 沿着不同的理论路径来阐释社会历史的演进和发展, 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和致力于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马克思是以全球视域的交往实践观为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基础地位。哈贝马斯是从语言学与释义学出发所建立的交往理性观作为主要理论基石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因此, 应从交往实践观的历史语境与交往理性观的当代话语的对话中, 重新解读马克思交往实践观的本真意义。

[关键词] 交往; 历史唯物主义; 重建

[中图分类号] B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881X(2005)05-0528-07

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历史唯物主义时把社会交往作为一个重要的基本范畴, 并进而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交往实践理论。他们认为: 交往主体的实践活动是一种能动的对象性的改造活动, 交往不仅具有沟通主体与对象之间关系的功能, 而且具有变革社会的价值指向功能。交往作为实践的一种基本形式, 是人本质的社会属性之一, 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必然体现。社会发展的深层原因, 就是通过人类自身交往实践改变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加以实现的。生产力的发展和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是社会进步的客观尺度。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也强调交往活动对社会演化的创新作用, 并试图以交往理论为基础来“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然而, 他是以语言性交往行为为基础的一般交往理论来“重建”历史唯物主义, 只是保留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名称, 而完全消解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质内容。这种“重建”不是修复和创新, 而是背离和抛弃。

—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 马克思、恩格斯多处使用了“交往”这个范畴, 并对交往实践范畴作了系统的、概括性地阐述, 使之成为新历史观的理论基石。他们写道: “到现在为止, 我们主要只是考察了人类活动的一个方面——人改造自然。另一方面, 是人改造人的……。”^[1](第88页) 把人类整体实践活动相对划分为人对自然的作用和人与人的相互作用两个方面。在人类的整体实践活动中, 人与自然界的互动用生产实践范畴来概括, 人与人的交往互动则用交往实践范畴来规定。这种规定是对人类实践的微观地深刻考察, 把交往看作是人类实践活动中的一个方面, 或者看作是一种不可或缺的重要方式, 揭示

出人类整体实践中生产实践和交往实践的辩证关系。探究生产劳动实践通过交往实践中介与社会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及其意识结构的真实联系，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历史唯物主义，揭示社会发展规律的基本理路。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交往根源于个体的物质生命活动本身，是人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这种需要是社会交往的内在动力，并且是通过社会生产来实现的。为了维持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人们必须首先进行物质资料的生产。这种物质资料的生产活动，是区别人与动物的根本原因，也是人的其他历史活动的物质基础。马克思、恩格斯说：“一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时候，这一步是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1]（第67页）“而生产本身又是以个人彼此之间的交往为前提的。这种交往的形式又是生产决定的。”^[1]（第68页）作为生产活动主体的劳动者，并非孤立的个人在生产活动，而是在彼此协作结成一定关系的许多人中的一员，否则难以生产活动。因此，对个体来说，他的一切需要的满足，都必然促使他个人的活动同社会生产活动发生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和相互交往，从而在需要和满足需要的交往中形成社会关系。

人通过自己物质生产活动的交往，为自己创造了一个社会关系系统，形成了人所特有的社会属性。在交往中，每个人通过自己的活动，把个体的本质力量对象化为现实的社会关系，并或多或少地改变着这种社会关系。同时，交往又以他人和社会关系为中介，形成或改变着个体的社会本质、品德、能力、素质等等。个人既是一定社会关系的承担者，又是一定社会关系的产物。人们的交往既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的相互作用，又是通过相互作用改变着和产生着新的社会关系。正是在通过交往活动建立起来的社会关系中，人们的欲望才得以表现出来，人们的利益才能得以实现。

交往不仅把个人结成为群体，而且把群体结成为社区和社会。个体之间的交往必然发展成一种特定的社会关系，并进而形成复杂的社会结构。特定的社会关系形成其特有的交往结构和交往形式；复杂的社会结构又常常形成制度化，使之以组织形式存在下去。随着交往的扩展、经济关系和其他社会关系的变化，交往结构和交往形式亦即随之演变，并将引起社会结构，甚至社会制度性质发生相应的变化。这表明：社会的演进过程，是离不开人们之间的相互交往，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就是通过社会交往及其交往结构、交往形式的发展、变化来体现的。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将交往从纵横两个方面作了一个基本的划分；一是标志着人类社会一定历史阶段意义上的交往，形成了“部落所有制”、“古代社会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等历史范畴和社会结构范畴。二是同一历史时代和同一历史发展阶段上在性质、状况、形式等具体方面有所不同的交往。

在任何社会形态中，社会交往都是由物质交往、精神交往和政治交往这三大基本类型所构成。物质交往是社会交往诸类型或形式的基础。因为，从事现实活动的人们“他们受着自己的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交往的一定发展——直到交往的最遥远的形态——的制约。”^[2]（第30页）人们的精神交往、政治交往都只有在物质交往的基础上才能进行。物质交往中形成的经济关系决定着人们的思想、政治关系。“而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1]（第73页）精神交往和政治交往对物质交往的发展又有着重要的制约和影响作用。精神交往通过知识传播、思想交流等方式来影响制约着物质交往的结构和形式的变化；政治交往所形成的一定政治关系，直接影响着国家之间和社会集团之间物质交往的方式、范围和程度。“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1]（第72页）。马克思恩格斯正是从交往实践的人出发，分析和考察了物质交往、精神交往、政治交往、语言交往之间的关联度及其链结，得出了“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的历史唯物主义结论。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曾经用“交往形式”、“交往方式”、“交往关系”等话语来表达当时他们意指的“生产关系”范畴。从而导致了将“交往”同“交往形式”“交往关系”的等同，进而将“交

往”同“生产关系”等等的错误解读。实际上,他们在论述这些术语时是有着严格区分的语境,并使用了不同的德国术语。Verkehr(交往)、Verkehrsform(交往形式)、Verkehrshaltisse(交往关系)Verkehrswaise(交往方式)。

以上,从我们对马克思、恩格斯新历史观理论文本的重新解读可以明显地看出:他们认为交往(Verkehr)是一个概括人与人之间相互作用的总体性、普遍性范畴。它包括物质交往、精神交往、政治交往、语言交往等具体形式。而物质交往是精神交往、语言交往等其它形式的基础。交往是源于人的生存和发展需要的多极主体间物质交换过程。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从来都是以主体对客体的改造关系为前提和基础的。实践范畴既包括主体改造客体的对象性活动,又包括主体和主体间的社会交往活动。交往作为人类实践的基本形式,它与对象性实践既具有差异性又具有互动性和制约性。因此,马克思恩格斯恩把考察“人对自然的作用”和“人对人的作用”作为其历史哲学的两个不可缺少的理论视域。

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是建立在普遍语用学基础之上的,并试图以交往的一般理论为基础来实现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他把交往的核心要素表达为“理解”(Verstehen),“把达到理解为目的的行为看作是最根本的东西。……冲突、竞争、通常意义上的战略行为——统统是以达到理解为目标的行为的衍生物”^[2](第1页)。他认为,使我们人类超出自然之外的只有一件东西:‘语言’,从而把交往行为理解为一种“主观际”精神交往活动,解释为一种意义的理解、文本的诠释、认知的交流。他强调人际间的语言和意义为中介的符号性交往行为。

由此,哈贝马斯把人的交往行为也作了类似马克思那样的划分,即主体对客体的目的性行为 and 主体间相互理解行为这两个方面。上升到理论层面,就是要区分“劳动”和“相互作用”两个基本范畴。他认为,劳动标志着工具行为或战略行为的某种形式,而相互作用表示在共同的、所有人客观上理解为接受的规范之下,至少是两个主体之间的相互联系。他把“劳动”理解为以知识为基础的技术法则所控制的“工具行为”。因为“在有目的——理性的行为中,仅仅假设每一个主体都遵循他已经为自己确定的偏爱和决策准则,这种偏爱是自式的,并完全不顾及是否与其他主体相一致”^[3](第121页)。把“相互作用”则解释为使用符号的交互作用即语言交往。而“与有目的——理性行为不同,交往性行为是定向于主观际地遵循与相互期望相联系的有效性规范。”^[3](第121页)显然,哈贝马斯把物质生产实践与使用符号的交往行为作了主观的思想关系的转换。消解了马克思实践范畴的客观物质性。他认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就是由于目的——理性行为引起了个人主义的泛滥,道德规范的沦丧和人性的异化。必须通过批判“工具——理性”而建立“交往合理性”范式,建构新的普遍全面的交往理性观,就可以解决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与危机,实现人的个性自由与解放。

从以上的简要概述,可以看到马克思、恩格斯和哈贝马斯都把交往作为建构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基石,但在交往的基础和实质理解方面他们是存在着根本分歧的。

首先,马克思的交往理论是从唯物史观的前提——现实人的实践活动出发,以物质交往为基础的交往实践观。它强调主体间物质交往的基础性地位,它所理解的交往实践是主体间的客观的物质性活动,它既不同于从客体的、直观形式来理解事物的旧唯物主义,又不同从精神、抽象能动性来理解实践的唯心主义,它是交往实践观的新思维。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则是以语言行为作为其基础,着重强调人际间以语言和意义为中介的符号性交往行为。把“主体际”和交往行为理解为一种“主观性”的精神交往活动,实现了交往的历史唯心化转向。

马克思并不否认语言交往的现实意义,他指出:“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因而也为我自身而存在的、现实的意识。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的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1](第81页)。语言是生产实践和交往的产物,语言产生后,又成为交往实践的形式,但它不是交往实践的前提和基础。语言和意识为中介的符号交往并非为占有和支配本身无价值的符号,它只是使交往有分享和传递语言的意境,达到共识和理解。符号交往实现意义分享和理解与物质交往的财富占有和支配是有着本质的区别的。因为,源于人的生存和发展需要的物质交往其直接目的是占有和支配物质财富。

其衍生的结果是人际关系和人的社会地位的改变。

其次，马克思的交往理论是从现实的交往实践活动的矛盾互动中，来说明交往的实质及其变革资本主义社会交往关系的重要性。交往实践是“自主活动”和“交往形式”的辩证统一，它体现了交往实践的自主能动性，具有工具理性的功能，又具有社会交往性的人文理性功能。因此，交往实践既构成技术——工具层面的动力，又构成了社会规范结构层面的动力。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是人的社会关系发展和道德进步的根本动力。

哈贝马斯则从工具性行为 and 交往性行为的对抗性关系中，通过批判“工具——目的合理性”范式、建构“交往合理性”的规范结构。割裂生产力和科技发展与道德进步、生产力发展与社会关系进步的联系，把主体对客体的目的性行为，目的——工具理性的片面性认定为导致人际关系异化和道德失范的根本原因。因而变革现实社会的途径，要通过建立对话伦理学，以“重建关于可能理解的普遍条件”，使之成为“交往行为的一般假设前提”^[2]（第1页）。

马克思认为，要解决现实社会的人性异化与道德失范的危机，不是去从理论上批判生产力的发展和科技进步，重建交往对话伦理学的“交往合理性”范式；也不是从抽象的理性道德原则出发，或从现实出发去引申某种新的理性原则。而是要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的私人占有制度，彻底地变革社会现实，以此作为重建人间平等合作的社会关系的现实基础。法和道德规范并非是作为先验之物的形式理性，而是特定社会集团物质利益关系的反映。离开生产实践和社会生产关系这一社会交往关系的核心内容，去谈论建立“交往合理性”范式，这种交往理性只能是一种空调的抽象，而变革现实社会的需求也只是一种乌托邦式的梦想。

二

马克思和哈贝马斯都从主客体和主体间的双重关系角度论证了交往行为与社会历史进步的联系，并把人对自然的自由支配程度和人的个性的成熟与发展程度作为社会进步状况的两个基本尺度。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他们在说明交往的社会功用和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般逻辑推演的思路是大相径庭的。

马克思是从人和自然、人与社会最根本的生产方式入手，来说明交往实践在社会发展和变革中的历史功用，把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交往形式的成熟性作为社会进步的尺度和发展动力。交往实践通过人们之间的相互作用活动，使社会系统得以形成，产生出一种超出于个人力量相加之和的社会结合力、群体凝聚力，推动着社会进步和个人的发展，交往及其扩大是生产的扩大和社会发展的必不可少的历史前提。这首先表现在推动生产迅速发展，“一定的生产方式或一定的工业阶段始终是与—定的共同活动的方式或—定的社会阶段联系着的，而这种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1]（第80页）

在生产力中劳动者个体的力量从自己方面来说，只有在“交往和相互联系中才是真正的力量”^[1]（第128页）。很明显，人与劳动工具、劳动对象的结合是在劳动的不同协作、分工、交换方式中得以实现的。只有当个人生产力以某种方式发生相互作用（交往）构成社会生产力主体，社会生产力才真正处于运动状态，从可能向现实转化。并且在共同活动方式中，以社会的集体的力量形式，产生出一种不同于个人生产力的社会整体生产力。

在物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生产关系，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把它称之为“交往形式”。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都是通过人们的活动、交往这一中介来加以实现的。“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关系就是交往形式与个人的行动或活动的关系”^[1]（第123页）。交往的扩展，是保存人类所创造的生产力和文化成果的手段。马克思曾经列举腓尼基人和中世纪的玻璃绘画术这两个事例来说明：“当交往只限于毗邻地区的时候，每一种发明在每一个地域都必须单另进行；一些纯粹偶然的事件，例如蛮族的入侵，甚至是通常的战争，都足以使一个具有发达生产力和有高度需求的国家处于一切

都必须从头开始的境地……。只有当交往成为世界交往,并且以大工业为基础的时候,只有在一切民族都卷入竞争斗争的时候,保持已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才有了保障。”^[1](第107-108页)正是因为交往具有保存人类文明成果的功能,交往的扩大和发展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至关重要。当旧有交往方式严重阻碍和破坏生产力发展时,要么维护旧有交往方式,放弃已有成果,使生产力遭到破坏;要么采用新的方式进行交往,保持和发展已有的成果,推动历史进步的抉择是用新的交往方式代替旧的交往方式,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

对社会系统来说,交往的程度、方式以及交往的扩大决定着它的面貌及其有机结构。发生着广泛交往的社会,内部联系紧密,协同合作程度高,相应地具有较强的自我发展能力。交往狭窄的社会,则是一种松散的共同体。人们之间相互隔绝,缺乏联系,不能由相互交往而形成整体,而导致以自我为中心的封闭状态,非常容易形成象中国古代社会那样专制的、独裁的皇权统治。马克思指出:“……一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也取决于自己的生产以及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1](第68页)

交往实践源于人的共同生命活动的需要,为物质利益驱动,成为实现社会关系和人们活动的方式,构成了历史发展的基本内容。马克思把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看成是形成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向共产主义演进的历史前提。社会经济形态的历史演变取决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程度,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又有赖于交往及其扩大的程度。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转化;商品经济的发展及其向产品经济的过渡,也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有关的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为前提的。只有普通的交往,“单个人才能摆脱种种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个世界的生产(也同精神的生产)发生实际联系,能获得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生产(人们的创造)的能力”^[1](第89页)。资本主义社会是以物的崇拜为主导的普遍交换社会,这种交往实践的异化造就了一个一体化的世界,形成了世界市场、世界生产和世界历史,从而为扬弃异化,建立新的交往实践规范结构创造了条件。消灭私有制,实现共产主义就是新交往形式的生产。

哈贝马斯是从考察个体儿童心理世界和道德意识的形成及成熟过程入手,以皮亚杰等人的认知心理学理论为基础,从分析个体人的心理发展史来推演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把人对世界的认知和对社会规范认知的理性化程度作为划分历史时代的尺度。把知识和道德规范看作是社会发展和交往关系发展的根本动力。哈贝马斯看来,人类社会整体发展是相对复杂的,而个体发生过程则比较具有典型性,因为“个体发生学模式当然比它们的社会——进化副本更能得到较深入的分析 and 确证。”^[2](第102页)他想通过比较个体与类、即个人与社会在发展阶段上的相似性来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逻辑,并以此代替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

马克思认为,研究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不应从研究个体主体出发,停留在心理认知和道德意识的层面。因为个人从一开始就是社会历史的产物,个人从脱离血肉之躯的自然母体之时就紧密地依附于社会母体,并通过交往进入社会生活之中。个体只有在交往中,在他人的身上才能意识到自我。“个人是社会的存在物”。社会历史就是人们相互作用、交往活动的历史。研究社会、追索历史的生成与发展及其不同的历史形态,无非是研究人们交往活动的结果。生产力的不断积累和进步及其交往的扩大与普遍发展,才是社会发展和交往关系发展的根本动力。

哈贝马斯从个体主体出发,以研究儿童心理形成过程入手,来抽象地研究人类历史发展阶段和过程,把知识和道德规范作为社会发展和交往形式变革的根本动力,这显然是与唯物史观根本不同的一种解释方式。

三

马克思、恩格斯从生产实践与交往入手,建构起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他们认为:从动态上把握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更深刻地揭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的内在机制,只有对生产过程

中的交往进行深入地研究,把实践理解为生产和交往两方面的辩证统一,才能够做得到。

因为个人生产力只有在交往中才能构成社会生产力主体,而且,在共同活动方式中,以社会的集体的力量形式,产生出一种不同于个人生产力的社会整体生产力。交往是社会生产运动必不可少的活动方式。这不仅在于劳动协作、分工、交换方式决定着人们相互间提供不同质和量的劳动,决定着个人生产力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劳动工具、劳动对象的存在方式和实现程度。而且还在于在劳动过程实行分工的条件下,生产过程的诸环节分布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分解为不同的独立过程,单独的劳动者不能成为完整意义上的生产力主体。只有通过物质生产过程中的交往,联系起来的总体才是生产力主体。这样,物质生产过程中的交往把低层次上的个人生产力的差异性、局限性,上升为高层次的、集体的或社会生产力的全面性和整体性,形成共同活动方式,以加速发展的趋势不断地增殖自身的力量。并强烈地冲击着生产力中主体和客体的相互作用和运动变化。正是通过交往,生产力系统内部要素建立起物与物,人与物、人与人的网络联系,形成现实的生产力。因此,生产力“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社会关系的含义在这里是指许多人的共同活动……。”^[1](第80页)生产力运动发展的根本源泉就在于生产力内部人、工具和劳动对象三个子系统及其要素的相互作用、不断变动、扩张,更新着生产力有机体,推动生产力发展。

在现实的生产过程中,生产关系既包括人们在物质生产过程中的物质利益关系,又包括劳动关系,这些关系是人们从事交往的产物。特别是物质利益关系、劳动关系,直接影响到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影响着对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运用和效能的发挥,以至影响着整个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是以主体交往、劳动关系为纽带而联结在一起的;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是通过生产过程中的交往形成的经济关系、物质利益关系而发挥其作用的。因此,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的交往表现出来的关系,是生产力发展的基本经济杠杆。

在哈贝马斯看来,历史唯物主义不是“历史的描述性图像”而是“一种社会进化理论”^[2](第133页)。但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客观历史主义性质,并不能提供对晚期资本主义的科学分析。因为,马克思是把物质生产及物质生活条件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出发点,形成了一种见物不见人的、“经济主义”的、技术主义的历史观。历史唯物主义的误区来自于把实践还原为技术;理论还原为工具式的理性;交往行为只是限制在离开了历史主体的生产力领域,而忽略了道德规范领域交往行动合理化。但是,“人们既不能从所选择的手段的技术方面,也不能从手段选择的战略方面使交往行动合理化,而只能从行为主体对自己行为的责任感和行为规范的辩护能力的道德实践方面使交往行动合理化。”^[3](第31页)特别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由经济领域转向于政治领域,在社会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在制度系统中得到体现的规范性、合理化结构。从交往理性的基础上概括文化传统和制度发展的普遍逻辑更为重要。因此,对社会历史的解释不能从生产力进步决定社会进步的理论中推论出来,而必须从民主化的进程方面来进行解释。而重建历史唯物主义,就是要重建为规范和价值进行辩护的普遍交往的前提和方法,以此来修复通过道德重建起积极作用的社会进化理论。

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必须划清两个理论维度。“目的合理的行动”是技术层面上的遵循工具理性的原则,而“交往的行动”则属于主体间公认的规范层面,遵循的是交往理性化的原则。历史唯物主义的缺陷在于只停留在第一层面,从生产力发展机制上去说明社会进化。而实际上在当代社会,第二层面才真正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因为生产力只有在交往理性的基础上实现了社会一体化时,才能真正地得到发展。可见,哈贝马斯是以规范性的交往理性来修正历史唯物主义,用自己的发展逻辑去取代和“重建”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提供一种新的社会一体化模式。

综上所述,马克思的交往理论与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虽然具有一些共同之处,但它们毕竟是两种本质区别的交往理论。

哈贝马斯把工具行为与道德规范、政治实践对立起来,把技术排除在交往实践之外,片面强调道德规范的作用,走向了传统的道德实践决定论。他的重建历史唯物主义只是语用学的派生物,具有思辨和

唯心的性质,他的交往观是一种抽象的语言理性主义,是一种交往理性观。

马克思的交往实践观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基石,在于其扩展了技术实践的内涵,从生产实践入手,以物质交往为基础来把握交往其它形式的次生性本质及其作用,正确地揭示了交往实践所具有的客观性、能动性、社会性、系统性等基本属性,全面地说明了交往实践的社会功用。

[参 考 文 献]

- [1] [德]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1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 [2] [德] 哈贝马斯. 交往与社会进化 [M]. 重庆: 重庆人民出版社, 1989.
- [3] [德] 哈贝马斯. 重建历史唯物主义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责任编辑 严 真)

Communication Theory & Framing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HE Jie-yi

(School of Humanities,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 & Law, Wuhan 430064, Wuhan, China)

Biography: HE Jie-yi (1955-), male, Associate professor, School of Humanities,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 & Law, majoring i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bstract: Karl Marx and Juergen Habermas have all regarded the Communication as an important theory category of their materialism view of history. According to their respective Communication theories, Karl Marx and Juergen have elaborated the advancement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ocial history in different theory ways, and established the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the reconstruction committed to the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his paper aims to briefly outline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Marx's communication theory and Habermas' Communication Theory, especially illustrate the important position of Marx's World History Communication Practice View in the Historical Materialism system and its function in advanc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ociety, evaluate the Communication Rationalism View based on Linguistics and Hermeneutics, and reconstruct the Historical Materialism mainly based on former Communication Rationalism View. From the historical context of Marx's Communication Practice View and the modern content of Habermas' Communication Theory, we will reexamine the real significance of Marx's Communication Practice View.

Key words: communicatio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reconstruction